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高质量发展

韩喜平 马丽娟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化与信息化产业技术革命的持续加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和创新。从理论上总结、概括新质生产力的先进质态, 在实践中培育和壮大发展新动能, 对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新质生产力在形成中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将着力点放在数字化、绿色化自主创新带来的效益提高、环境改善、结构优化、韧性增强上。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打通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变革生产关系以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配, 塑造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新引擎。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创新驱动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24)04-0004-08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24.04.001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 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整体转型的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马克思指出: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 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 生产力是不断进步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 新的生产力不断涌现。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化与信息化产业技术革命的持续加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和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 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2] 这为新时代全面推进经济发展动力变革提供了行动指南, 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进步的内在规律使然

生产力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征服和改造自然, 并使其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从思想史谱系看, 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从构成要素上针对生产力的形成进行了初步探索。具体来说, 魁奈提出“土地获得生产力”;^[3] 亚当·斯密提出“劳动生产力”, 并强调分工可以使其增进;^[4] 萨伊提出资本、土地、劳动三要素能够创造商品价值;^[5] 大卫·李嘉图指出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生产力的差异取决于资本、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比例;^[6] 李斯特提出交换价值决定生产力, 而生产力水平则决定国家财富和福利水平。^[7] 在对以往的

[作者简介] 韩喜平,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专项)“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机理研究”(项目批准号: 2024WHSX1)。

生产力思想进行批判和吸收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关于生产力形成及其能级演化的体系化、系统化理论。从根本上看,生产力是由生产要素内部及其之间以一定结构组合而形成的有机系统。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8]其中劳动者是构成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重要的能动要素。生产力属于历史范畴,能够自己增殖、自己更新。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9]一方面,劳动过程中如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等简单要素会更新;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管理等新的要素也会加入劳动过程。马克思高度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他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0]“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11]同时,“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12]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从相适合到不相适合,再到新的基础上的相适合,如此循环往复,成为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最终动力。马克思指出,当“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3]只有全部生产要素共同作用,潜在的生产力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并由此产生新的生产力。生产力是在人与人之间以一定方式结合而形成的生产关系中运动的。在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后,生产关系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形式。随着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就会逐渐变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束缚,这时生产力发展要求从根本上变革生产关系。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建立在原有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但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所以不同部分

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同步变革的,而是“或慢或快”。

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由于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质的提升而形成的更为先进的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从基本内涵看,新质生产力是与数字化生产要素相适应的生产力的质的跃迁。一方面,数字化赋能整体提高全部生产要素的内在价值。主要表现为劳动者的数字素养、数字技能不断提高,以脑力劳动者为代表的高质量劳动力成为生产力中的决定性因素;劳动对象的边际成本不断降低,强渗透性和融合性等不断增强,大数据、芯片等基础性资源和战略性资源成为重要劳动对象;生产设备、基础设施的科技含量与创新特质也不断提高,算法和算力等成为新型劳动工具。另一方面,数字化赋能系统优化生产要素之间的结合方式。数字化赋能有效提高生产要素之间的投入比例及其配置效率,如数字化劳动者和劳动资料能够采取采集、编码、存储和赋值等方式直接作用于数据和信息等新型劳动对象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力系统的发展逻辑。从主要载体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和方向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4]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15]以此观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是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合理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基础设施产业、一般制造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新兴产业集群以形成完整产业链和深度升级产业结构。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深刻揭示并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当解放和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这一根本命题,这是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马克思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

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6]总的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还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运行体制机制、深刻变革制度体系。

二、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17]因此,既要从回溯历史的视域切入,分析新时代以来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形成并推动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内在规律;也要从折射现实的视域切入,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和运行机制,从而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引领高质量发展实践的扎实推进。

1. 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18]新质生产力内生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转变的必然要求,也成为我国经济向形态完善高级、分工精细复杂、结构升级优化,同时内在优势充分释放的阶段演进的根本动力。现阶段,新质生产力已展现出巨大的经济发展动能。一方面,随着技术、人才、市场等先进要素的融合裂变,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长向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转变。另一方面,随着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发展逐渐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发展转变,且成效初显并趋向完善。

新质生产力形成并促进经济发展量的合理增长。知识、技术、管理、制度、信息等质量型要素构成新的生产结构和新的动力体系,促使我国经

济增长既具有保持稳定速度的能力,也具有未来继续实现较高增长速度的潜力。1978—2011年,借助适龄劳动力资源丰富、政策性和体制性需求旺盛、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叠加优势,我国经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保持年均9.78%的高速增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囿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外资退潮、外需疲软等问题,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经济增速从2012年的7.8%下降为2023年的5.2%。从世界经济增长的规律看,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社会生产规模就会逼近生产可能性边界,那么经济也会随之呈现出慢增长、弱复苏、低就业、高风险等特征。譬如,1960—2010年,受能源价格暴涨、财政赤字激增、经济高度泡沫化等冲击,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39.17%下降到23.13%,期间三次峰值呈现分别为1962年39.17%、1985年33.66%、2001年31.97%。相反,得益于高新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跃升等新兴驱动力的作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仍然保持6%~8%的中高速增长。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572万人,是2012年的1.8倍,稳居世界首位;R&D经费稳步增长,2022年首次超过3万亿元,是2012年的3倍;2022年中国创新指数比同期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快0.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科技人员增多和科研经费增加、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及劳动人口素质提升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仅均具有滞后性,并且在作用发挥上也受到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的多重制约。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各类高质量要素将会发挥对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加之随着生产要素市场配置机制等加快完善,各类高质量要素将会更加有序流动、更加高效配置。

新质生产力形成并促进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基础产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未来产业等不同产业的迭代演化,产业体系整体质量及现代化水平的高效提升,促进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深度转型的加快推进,进而显著提升经济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大规模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经济发展主要依

靠投资和出口双轮驱动。虽然我国承接全球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附加值已经呈现出持续提高趋势,但是产业结构整体上仍然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造成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需求结构升级等矛盾突出,导致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进入新时代,在供给端,从产业形态看,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广泛运用,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高技术制造业,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电子商务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等符合价值链升级方向的新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产业结构看,2012—2023年,工业附加值达到峰值之后回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提升。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工业,2015年超过50%,2023年达到54.6%。相反地,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则从45.3%下降为38.3%。这意味着产业结构从扩能增量为主逐步向调整存量、做好增量及提升质量并行转变。与之相适应,在需求端,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1.8%,超过资本形成的50.4%,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2023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2.5%,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更加显著。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使我国经济具有持久的发展稳定性。但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在供给端仍然存在产业基础能力不强、产业链水平不高等短板,以及虽然产业结构趋向多元化,但是产业结构现代化尚未实现等弱项;在需求端仍然存在投资规模增长过快,有效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等瓶颈。这就导致我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仍然突出。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粗放问题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具有一定的惯性影响。

2. 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互为叠加,周期性矛盾、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等多重压力。但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高质量发展要素条件也在集聚增多。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生物

制造等领域技术加快突破,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绿色消费倒逼生产方式绿色转型等。这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经济在战胜挑战中发展壮大提出了新的要求。

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深入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特点,加强人工智能和产业发展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19]推进以数据要素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能够加快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投入型逐步向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型转型,并能为进一步向创新引领型转型提供基础。我国拥有的庞大的数据资源以及与之相适配的多元化应用场景。数据要素极具流动性,数据要素进入生产函数可以促进其他生产要素实现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数据要素在本质上具有规模报酬递增、低成本复用等鲜明特征,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有机结合可以突破传统资源要素约束,优化高质量资源要素配置,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技术可以高效贯通研发、生产、流通、服务和消费各环节,不仅能够缩短全社会创新链,而且能够推动全社会价值链协同。在发掘数据要素潜力的同时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有利于在促进数字产业化的同时推动产业数字化,形成以技术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领域应用带动技术进步的发展格局。比如,催生众包、众筹平台等新型企业,既能够营造开放式创新生态,也能够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发展推动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直播经济等新业态,能够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数字金融、数字商贸、自动驾驶、语言智能等体系化的人工智能服务,能够引领新型消费加快发展。推动跨境电商与数字化国际贸易,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技术支撑和贸易空间。

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减少经济发展消耗。我国人口规模大,资源能源约束紧,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这些情况构成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约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同样要求绿色发展。发展新质生

产力不仅要以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完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加大绿色科技创新方面的基础性研究为动力,同时要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持续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为关键,而且要以推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为导向。这有助于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用地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农业投入结构等,也能够将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贯穿“规划、设计、投资、建设、生产、流通、生活、消费”经济全链条。从这层意义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过程中根本变革粗放型增长方式,转而采取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遵循、以“三低一高”为主要特征并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而且能够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加强新污染物治理、破解气候环境危机、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防范生态环境风险、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优化升级经济结构。高质量发展体现在供给、需求、流通和分配等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抓住提升供给质量这个“牛鼻子”,以此提高流通效率、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激活消费潜力,推动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产业结构看,202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4.6%,这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两个70%”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统计,2022年三二一产业的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是44.7%、24.0%、10.5%,可见数字技术对服务业渗透率之高。发展以大数据技术体系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可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并促进新知识与新技术向制造业的溢出和应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以及推进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加速融合。从收入分配结构看,随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快速发展,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会竞相涌现,金融市场机制也会趋向完善,这有利于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有利于加快低收入群体向中高收入群体迈进的步伐;同时,数字化的新

从业形式对劳动者高新科技掌握程度等会提出更高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调整和优化包括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等在内的生产关系。从消费结构看,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提供更多的高品质、高性能、高安全性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地创造和引导社会有效需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此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孵化培育周期长、回报周期长、投资风险高等显著特征,这既要求各级政府以一定比例的产业投资基金予以支持,也要求社会资本向相关企业快速流动、加速聚集,从而为其成熟扩散缓解融资难题。总之,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

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增强经济韧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前景黯淡且不确定性加剧成为全球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技术创新是提升经济韧性的关键,自主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特征。从这层意义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提高我国经济有效抵御风险的能力。从微观层面看,发挥国家重大科技创新的组织及保障作用,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应对经济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破解经济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并释放助推全球经济复苏回稳的潜力。从中观层面看,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体系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产业链供应链拥有潜在的稳定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当前,随着比较优势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我国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着力补齐短板、拉长长板、锻造新板,有利于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技术效率和现代化水平,进一步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创新驱动力和核心竞争力,提高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从宏观层面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20]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自主创新领域率先探索并将成熟技术及其相应产业线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既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高强度的外向

型经济和增加财富积累,又有利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塑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并加快追赶崛起。

三、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命题,也是社会组织与体制改革命题。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推动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生产关系要进行变革并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互适配,就能够有力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1. 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

新质生产力的驱动要素就是科技创新,特别是这一过程中涌现的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新型举国体制“新”在能将我国政治制度优势与市场机制作用协同起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调动创新资源集中攻关,加快科技创新补短板、扬长项,解决“卡脖子”科技创新难题。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核心在于处理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针对创新资源流动受阻、创新资源配置低效、创新要素难以汇聚等短板,科技创新力量布局分散重复、协同不力、组织无序等弱项,既要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创新资源向技术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的领域充分涌流;也要发挥政府和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确保科技创新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高度一致。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导向在于攻克重大科技难题。新型举国体制并不主张“一刀切”,也不要求运用这一体制解决所有的科技问题,而是要聚焦社会资本难以进入、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致力于在前沿基础研究、“从0到1”的原始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民生科技和国防科技等若干重要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保障新型举国体制的运行需要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协同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各项改革应在坚持系统观念、加强科学统筹中稳步推动、有序展开。必须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体制,强化科技创新决策指挥机制,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组织管理机制,建立与新型举国体制相适应的政策体系等,

实现以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合力推动科技创新及促进科技成果高效向新质生产力转化。

2. 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

必须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重点保障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有序实施、协调运行,加快推动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从而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持续的人力资本支撑。一是要优化科技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模式。结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发展趋势,探索符合新时代特点的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推进科教融合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实施校企联合培养卓越工程人才、善用田间地头培养知农爱农新型人才,构建高水平、多层次的科技创新人才体系,为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二是要加强国际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引进力度。加强国内人才制度环境建设,推动海外科技创新人才柔性引进,完善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在华永久居留制度和技术移民制度,为海外科技创新人才在华工作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适宜环境,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政策的“磁场效应”和“虹吸效应”,从而让世界各地的科技创新人才引得进、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三是要用好用活各类科技创新人才。完善科研任务“揭榜挂帅”、“赛马”制度,为各类科技创新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持续深化科研领域“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地降低申报、考核等环节对科研活动的冗余干扰,完善科技创新人才评价体系,以此支持科技创新人才心无旁骛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四是要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人才发展环境。根据不同科技创新人才的需要切实开展有计划、有系统的跟踪培养,大力提升科技创新人才的工资薪酬及生活待遇,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

3.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必须促进更多科技、人才、数据等优质要素融入实体经济,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维度看,这要求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尚处于加速起步状态的这一时期,改造提升而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或者一哄而上、泡沫化发展新兴产业。要致力于从根本上扭转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趋势,缓解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一方面,优化传统产业存量。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和开展重大技术装备攻关,破解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面临的中低端产能过剩、产业碎片化以及国际竞争力不足等瓶颈。另一方面,扩大新兴产业增量。要打造数字处理芯片产业、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信息通讯产业和新制造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依托城市群建设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发展;同时要开辟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等未来产业新赛道,促使未来产业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柱。城乡区域应科学研判资源环境、要素禀赋、功能定位、科研条件和产业发展等自身发展条件,因地制宜打造具有自身发展特色、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丰富城乡现代化产业协同发展特色与种类,依托数字化重构城乡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提高城乡现代化产业关联度。东部地区要放大改革创新示范效应,在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上实现突破,率先激活发展新潜力、迈上发展新台阶;东北地区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发展清洁能源和新兴特色产业,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将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创新创造上升为推动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这也是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概念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提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4. 出台规范要素流动及产业转移的支持和引导政策

一是加快出台深化数据要素质量改革的相关政策。采取有效的管理和技术手段,完善数据要素产权、流通交易、开放共享、收益分配和安全认证等方面的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加快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化进程,规避数据要素运用中如侵犯个人隐私、“唯数据论”等潜在的伦理风险。二是出台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及产业有序转移的相关政策。针对

我国个别地区仍然存在的制约资金、技术尤其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各种隐性壁垒,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重点化解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政策与户籍挂钩问题;同时针对我国城乡区域间存在的产业同质、资源利用低效、合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破除制约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进一步完善有利于民间投资发展的政策环境,促进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高效聚集。三是推出促进新质生产力市场主体生成的激励性政策,健全税收、贷款、财政资金等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倾斜性政策,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法律法规,构建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配套的政策体系,持续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优势转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

5. 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基础设施

新质生产力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推进5G、F5G全光网络、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优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基础设施的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强化数据资源深度整合,促进数据资源高效流通。一是持续推进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发展区域数据中心集群,引导区域范围内数据中心集聚,优化数据中心供给结构;推进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建设,优化国家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布局,推进网络互联互通;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数据中心协同共建、联通共用的国际合作,提升全球化信息服务能力。二是加快中小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方政府建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协同推进机制,加快推进中小城市千兆光网、5G承载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部署面向中小城市的云资源池、边缘云节点、内容分发网络(CDN)等应用基础设施建设。三是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运营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探索实践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推进经济欠发达地区项目建设,在基础设施领域推进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相关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择优给予资金支持,引导电信运营商投资下沉,弥合数字鸿沟。要重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在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互动关系,及时调动市

市场主体活力,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

6. 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从域外经验看,在18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的三次产业革命中,伦敦率先建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美国和德国而后形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两大阵营,波士顿与硅谷地区也同样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些国家和城市皆是通过建立世界创新资源的集聚中心和创新活动的控制中心,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技术变革的引领力量,并推动新型生产力的快速发展。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逐步填补技术领域空白并完善技术体系,实现后发国家技术赶超。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以自主创新先发优势引领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深化,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流动和优化配置,科技创新也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界限,演化为创新体系的竞争,创新战略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我国必须因时制宜、顺势而为地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契机,加快释放新质生产力。展开来说,北京可以发挥高层次人才云集及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主阵地作用,以及运用“三城一区”的主平台功能,率先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上海可以发挥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和创新成果“原产地”属性加强等动态优势,依托上海自贸区等国际化创新载体,推动全球创新资源、世界顶尖技术平台及研发机构集聚,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发挥三地科技创新各有所长、优势互补的独特优势,依托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集群等创新载体,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加速抢占新一轮科技创新高地。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还要扩大区域创新合作交流范围,健全区域创新体系,并培育开放的创新生态,推动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

参考文献:

[1][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222,591-592,172.

[2][17]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

[3][法]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译者:吴斐丹,张草纫.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352.

[4][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译者:郭大力,王亚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7.

[5][法] 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译者:赵康英等.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157.

[6][英]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译者:郭大力,王亚南.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5.

[7][德]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译者:陈万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27.

[8][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8,743.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00.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1.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12.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3.

[14]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人民日报,2023-09-10.

[15]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23-12-13.

[18][20]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215,325.

[1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基础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N].人民日报,2018-11-01.